

中共党史上的两个历史决议

中国共产党对待自身历史的科学态度
——以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为例

张 健 任春峰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两个《历史决议》, 不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而且也成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典范。在起草两个《历史决议》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对待自身历史的科学态度,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充分发扬民主, 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郑重对待党的历史;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评价党的历史; 三是抛开个人恩怨, 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客观分析党犯错误的原因; 四是着眼事业长远, 以发展的眼光全面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历史决议; 科学态度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扩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均简称《历史决议》), 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两个重要文献。两个《历史决议》客观公正地对党的若干重要历史问题进行了回顾评析, 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在开展党内大讨论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 不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而且也成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典范, 其对待党的自身历史的郑重态度和科学精神, 更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和继承发扬。

一、充分发扬民主, 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郑重对待党的历史

从两个《历史决议》形成的过程看, 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广泛而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全党集体智慧、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的产物, 体现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郑重态度。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会上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从而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帷幕。会议结束时, 决定由毛泽东作一个书面结论, 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 也就是后来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最初草案。但“随着中央内部整风开始, 印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 讨论逐步深入, 感到原来的1941年草案稿有些认识就不够了”^①, 于是历史问题草案稿的

收稿日期: 2011-12-01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KZX10083)

作者简介: 张健,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300071)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任春峰,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①胡乔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 1986年1月13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66页。

讨论被搁置了下来,转而进入全党整风阶段。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1年到1943年这段时间内进行了数次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之后又在1943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内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了同样的讨论。在此基础上,1944年5月开始重新起草《历史决议》。

对于决议的起草,中共中央领导人极为重视,毛泽东亲自领导和主持起草工作,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还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担任召集人。任弼时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稿(简称“任稿”),在结构、内容和文字上与先前起草的《结论草案》基本相同。在“任稿”之后,胡乔木也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稿(简称“胡稿”),其分析四个问题的写法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接近《决议》的正式稿。在任弼时修改此稿之后,还有张闻天的修改稿(简称“张稿”)①。在“张稿”的誊清稿基础上,1945年春毛泽东又动手作了7次重要修改。

从1941年9月开始着手起草,到1945年2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正式通过,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形成历时近4年。其间经过了大范围、长时间的讨论修改,几易其稿。据胡乔木回忆:“历史决议草稿交给中央全会之前,已在相当大的范围进行了讨论。交给全会之后,讨论的范围更大了。讨论是频繁、认真、深入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斟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段落,讨论得很仔细。那时中央领导层的讨论也很认真。这种讨论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每次修改都是以这些讨论为基础。这样地讨论历史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讨论的水平、决议的水平,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②“这个稿子修改的次数难以统计。”③因此,第一个《历史决议》可以说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所指出的“这个决议案写过多少次,经过三翻四复的研究,经过多少双眼睛看。单有中央委员会几十双眼睛看还不行,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④

中共中央为何如此重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决议草案作说明时指出“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⑤正因如此,中共中央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郑重对待《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使之发挥了总结历史、开辟未来的重要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形成,也是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经历了长期的酝酿讨论和发扬民主的过程。

1979年6月,中共中央针对思想解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为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决定对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一个总结,对这段历史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这个总结和说明,就是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⑥。同年10月底,中共中央决定以这篇讲话稿为蓝本,开

① 参见程中原《胡乔木与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

② 胡乔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和七大》(1991年11月7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73页。

③ 胡乔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和七大》(1991年11月7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75页。

④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321页。

⑤ 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282页。

© 1999-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⑥ 这篇讲话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7-247页。

始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

从1979年10月底组织起草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经20个月。在这20个月中,仅邓小平、陈云就对决议的起草、修改和定稿提纲挈领地发表过谈话、讲话十几次,主持起草工作的胡乔木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提出了一些颇具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中间还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参加讨论的范围比第一个《历史决议》更加庞大,不仅充分集中了全党的集体智慧,还在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征求了意见。正如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所总结的“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①《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成为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的典范,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郑重态度对待自身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二、坚持实事求是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评价党的历史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它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认识论运用到党的实际工作中,努力防止和克服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某些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由于种种原因曾不同程度地偏离过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党都能最终纠正自身错误,重新回到这一思想路线上来。在对待自身历史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同样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对历史问题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回顾、总结和评价。

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1927至1937年这段曾出现三次严重“左”倾错误的历史,特别是要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毛泽东对此采取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的态度。他对决议“抄清件”进行过两处重要的修改:一是进一步强调了党的六大的正确方面,指出后来的“左”倾思想主要不是由六大来的,相反恰恰是违背了六大的基本方针;二是既进一步肯定了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的积极方面,也指出它的缺点和错误在于,对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以及相当时间以来就有了的若干“左”倾错误政策并未加以清算^②。在第七次修改时,毛泽东又加写了这样一段内容“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及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联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团结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我党愿与各界人民建立武装志愿委员会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的错误。”^③对于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毛泽东认为“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用这个方针,因为那时许多干部不了解,不成熟嘛!那时采用此态度是正确的,这次还采用此态度。”^④正如胡乔木后来在回忆中所指出的,这些分析都是实事求是的,避免了简单化和片面性。

①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7页。

②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310页。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314-315页。

④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312页。

在毛泽东的领导和主持下,第一个《历史决议》首先实事求是地概括总结了建党以来24年的奋斗历史,既肯定了伟大的成绩,也没有回避奋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如对八七会议的评价,首先肯定其历史功绩,并指出这是主要方面,同时又分析了它的局限性在于:“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①,在政治上“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②。决议对六大的分析也遵循了这一原则。决议在根本否定“左”倾路线的错误同时,没有否定一切,而是坚持了辩证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③

正是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和辩证分析的科学方法,决议在最后总结时指出“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④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同样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提出“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⑤陈云也强调“关于建国以来三十二年中共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总之“要分别不同情况”,“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⑥。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功过问题。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⑦胡乔木也指出:决议稿上说,从八届十一中全会起,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将来这样写出来,当然对我们党的历史是很不好看,对毛主席也很不好看。可是,我觉得这没有办法,既然要写这个决议,这一笔就不写不行。”^⑧另一方面,中央领导人也强调,应当看到“文化大革命”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7页。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7页。

③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0页。

④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页。

⑤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2页。

⑥ 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1981年3月,《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⑦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2页。

⑧ 胡乔木《〈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1980年9月21日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

中毛泽东在犯错误的同时也有正确的一面。如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 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①“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 尽管毛主席确实错误不小, 但他的好多见解也是正确的。比如, 在对外政策方面, 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 反对霸权主义, 确定中国永不称霸, 确定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些思想都是很好的, 将继续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②胡乔木也认为“应该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里面的一些功劳: 第一, 毛主席基本上维持了解放军……这是非常大的功劳, 这是非常显著的事实。如果不看到这个事实, 那是太不公正了。第二, 他基本上维持了国务院……维持了一个国务院, 这对全国人民, 对中国这整个十年, 关系是很大的……第三, 毛主席基本上还勉强维持了党的统一。这一点, 也非常重要。”^③正因如此, “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 但他确是(至少主要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基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④。

对于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建国后至“文革”前这 17 年的问题。邓小平指出: 这段时期“有曲折, 有错误, 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 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 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⑤。对争议较大的十年建设(1956-1966 年)问题, 邓小平也定下了基调, 指出这 10 年“应当肯定, 总是好的, 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 犯过错误, 但成绩是主要的”, “经济上发生过问题, 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充分肯定成绩, 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 我们还是经验不够, 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当然, 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 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 承担了责任”^⑥。

对于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 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 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 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 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 这十年中间, 也还有健康的方面。”^⑦他认为“文革”期间外事工作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尽管国内动乱, 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 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例如, 促成基辛格访华, 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 中日建交, 我国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 这些“都是事实”^⑧。因此, 邓小平指出如果否认这些健康的方面, 也是极端、片面和错误的。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 32 年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 指

①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 年 3 月-1981 年 6 月),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第 295 页。

② 邓小平《要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各个方面》(1981 年 3 月 24 日), 《党的文献》2011 年第 3 期。

③ 胡乔木《〈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1980 年 9 月 21 日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乔木文集》第 2 卷, 第 138 页。

④ 胡乔木《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1981 年 5 月 19 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胡乔木文集》第 2 卷, 第 160 页。

⑤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 年 3 月-1981 年 6 月),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第 295-296 页。

⑥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 年 3 月-1981 年 6 月),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第 302 页。

⑦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 年 3 月-1981 年 6 月),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第 302-303 页。

⑧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 年 3 月-1981 年 6 月),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第 305 页。

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①,并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详细列举了建国以来的主要成就,有力地纠正了党内一些人夸大错误、否认成绩的以偏概全思想倾向。肯定成绩,并不意味着回避错误。决议在列举了建国32年的伟大成就之后,紧接着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②。

三、抛开个人恩怨,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客观分析党犯错误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③。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切以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看待和处理问题。领导、主持和参与起草两个《历史决议》的党的领导人和中高级干部,大都在决议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内受到过不同程度的错误批判和打击,但是他们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大局为重,因而能够抛开个人恩怨,客观地分析评价这段历史以及党犯错误的深刻原因。

在讨论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过程中,毛泽东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④“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⑤

在这一思想认识的指导下,第一个《历史决议》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指出“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⑥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胡乔木回忆“历史问题决议特别写了两大段话,一方面是要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另一方面是讲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批评他们的错误的时候,首先申明他们作的哪些工作是正确的。”^⑦这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的做法,使《历史决议》能够超越个人恩怨,在思想认识层面深入剖析错误路线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94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97-798页。

③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

④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6-407页。

⑤ 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⑥ 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284页。

⑦ 胡乔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和七大》(1991年11月7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72-73页。

发生的深刻原因。

针对党内许多同志对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简单结论的思想倾向,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①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历史决议》在详细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之后,也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是一致的。”“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 and 改正错误。”“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②

正是由于抛开个人恩怨,从社会根源和思想认识层面剖析错误产生的原因,《历史决议》在还没有正式定稿时,就获得了党内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的广泛认同和接受。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与会同志发言都表示完全同意决议草案内容,对于决议草案未提宗派问题,未讲品质问题和对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不作结论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都完全拥护。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再次表示要继续检讨错误,承担责任,汲取教训。博古同志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和信心。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这个态度是诚恳的,可以说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③。

邓小平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多次强调“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④“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⑤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客观公正的定位,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⑥“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

①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939页。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0、997页。

③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318页。

④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

⑤ 邓小平《要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各个方面》(1981年3月24日,《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25页。

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①

1980年6月,邓小平又从制度层面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认为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制度最重要。“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②8月,他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又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③

针对党内四千人大讨论中出现的一些思想混乱,邓小平深刻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④“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⑤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时,邓小平再次强调“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我们不能丢”^⑥。对此,陈云也深表赞同,深情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⑦胡乔木也认为“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恶感,可是,我们还是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小孩一块倒掉。毛泽东思想是多年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⑧

胡乔木还从认识层面分析了之所以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错误的原因,指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长期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形成一种思想倾向,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这种情况虽然有个人的因素,但不仅仅是个人的因素。”^⑨“所有的错误,党都要负责任,不能说党不负责任”,因为“那么多中央委员,没有人起来反对呀,我也是个中央委员,我也没有反对呀”^⑩。总之,是“长期阶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在转到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时候,没有转成功”^⑪。

从起草到最后定稿通过,两个《历史决议》都体现了党的领导人和全党同志不计较个人恩怨、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36-837页。

②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4-165页。

④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

⑤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302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180-181页。

⑦ 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1981年3月),《陈云文选》第3卷,第285页。

⑧ 胡乔木《〈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1980年9月21日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48页。

⑨ 胡乔木《〈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1980年3月15日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一次谈话纪要),《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31页。

⑩ 胡乔木《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1980年9月21日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38页。

⑪ 胡乔木《〈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1980年3月15日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一次谈话纪要),《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31页。

顾全大局的高贵品格,特别是在历史上受到过不公正待遇和严重打击的一些领导干部,更是展现了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的高风亮节和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的博大胸怀。

四、着眼事业长远,以发展的眼光全面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

鉴往知今,继往开来。从起草和通过两个《历史决议》的目的来看,都是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长远发展,以发展的眼光全面总结党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而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使全党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共同奋斗、继续前进。

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①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第一个《历史决议》为了使全党同志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分别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列举了“左”倾路线错误的具体表现,同时指出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很深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从思想方法、政治倾向和组织生活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其产生原因,进而指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②

正是由于认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方针,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形成和通过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同时,也取得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和空前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初衷,如邓小平所指出,也是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③。“中央全会作出决议后,在十二大上根本不提历史问题了,天天纠缠干什么?要把精力引导到四个现代化,要向前看。”^④在谈到具体的起草意见时,邓小平强调决议的中心意思应该有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9页。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6页。

③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④ 邓小平《制定历史决议的三个目标》(1981年4月18日),《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①因此,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澄清党和人民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把全党全国人民的精力集中到现代化上来,从而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决议通过后,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式上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②时隔30年之后再看第二个《历史决议》,它不仅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的分析阐述:

第一,关于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决议指出“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③今后必须“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④。决议还指出,“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加以克服”^⑤,尤其是“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⑥。决议中对党的建设制度化问题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强调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问题,以及提出党风建设的重要性等,都成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二,关于党的领导制度和执政方式问题。决议强调,今后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必须坚持集体领导,“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⑦。决议还指出“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⑧这实际就提出了党的执政方式转变问题,强调了依法治国、按党章办事的重要性。

①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298、299页。

②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81年6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3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19页。

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44页。

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39页。

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44页。

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44页。

⑧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11页。

第三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问题。决议指出“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①决议还指出,“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②。这实际上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确立的国家发展道路,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指明了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正是由于能够广泛而充分地发扬民主,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郑重对待党的历史,能够坚持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评价党的历史,能够抛开个人恩怨,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客观分析党犯错误的原因,能够着眼事业长远,以发展的眼光全面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才最终能够正确面对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在分析认清产生错误的根源基础上,勇于纠正错误,并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继续坚定不移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懈奋斗。也正是在正确认识 and 纠正错误的过程之中,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阶段性成果的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发展成熟起来。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cientific Attitudes towards Its Own History:

A Case Study on the Two Drafts of “*The Resolution of History*”

Zhang Jian , Ren Chunfeng

Abstrac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wo copies of “*The Resolution of History*” formatted in two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re not only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people, but also as a model to correctly deal with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Party. In the process of drafting the two “*historical res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d scientific attitude towards its own history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ly, to play fully democracy tradition towards the Party's history by serious attitude for responsible to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Secondly, to evaluate the Party's history by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ith the guide of scientific Marx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irdly, to analysis the reasons of the Party's mistakes by setting aside personal grudges with standing in the objective position of the Party; Fourthly,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by focusing on the cause of long-term vision.

Key Wor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Resolution of History; Scientific Attitudes

[责任编辑:张栋豪]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37-838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40页。